

# 袁世凯幕府领袖

## 徐 世 昌

袁世凯可称得上是一代枭雄他从天津小站练兵起家，历任清朝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内阁总理大臣，权倾朝野。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趁机从清王朝的孤儿（小皇帝溥仪）寡母（隆裕皇太后）手中夺得政权，从一个封建王朝的权臣，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

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以后，又肆无忌惮地破坏共和制度，他通过一系列毁法造法的活动，赋予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这一切均得手后，袁世凯又得陇望蜀，悍然宣布恢复帝制，自封为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作为一代枭雄，在政坛呼风唤雨数十年，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结交并网罗了一大批为其效力的爪牙帮凶。在袁世凯的众多幕僚中，徐世昌的地位最高，作用最大，可以称之为袁世凯幕府领班，首席军师。

### 一、徐世昌与袁世凯一见倾心、结为金兰之好。

徐世昌，1855年10月22日（清咸丰五年九月三十日）生于河南卫辉府城内曹营街，字卜五，号菊存，一号鞠人，晚号弢斋、

水竹邨人、石门山人、东海居士等。

徐世昌的远祖在明朝末年由浙江省鄞县迁居河北（当时称直隶）大兴县，清朝乾隆年间又移居天津。徐世昌高祖徐城曾任河南南阳县知县，后葬于河南汲县，以后徐家就寄居该县。因此之故，徐世昌便有了浙江、直隶、河南三个籍贯，为他日后广结乡谊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与袁世凯等河南人便称河南同乡，与孙宝琦、钱能训等浙江人便称浙江同乡，与冯国璋、王士珍、曹锟等直隶人便称直隶同乡。总之是左右逢源。由此一点亦可想见徐世昌为人周到圆滑的一面。

徐世昌虽然出身于世家，但他 17 岁时父亲就一病不起，徐家从此中落。徐世昌兄弟在刘太夫人的严厉督课下，发奋读书，其后随叔祖父到河南沁阳、太康、淮宁等县幕府担任文牍工作，每年可得数十两银子养家糊口。

1879 年（光绪五年），在淮宁县署办理文牍的徐世昌听说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父）祠中的园林不错，遂往游览，适巧袁世凯亦在园中，两人不期而遇。徐世昌见袁世凯“状貌伟然，殷勤接语，纵谈当今之务，惊以为奇，因委心纳交。”

徐世昌长袁世凯四岁，徐为盟兄袁为契弟。

1882 年（光绪八年）壬午科乡试，徐世昌偕弟世光双双赴京应试。兄弟二人对于能否中举，毫无把握，心中因此忐忑不安。他们听说京城前门外琉璃厂吕祖庙最为灵验，遂在他人的引导下，前往求签，以卜吉凶成败。在吕祖庙，兄弟两人抽得一签，上写“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乡试结果，徐世昌兄弟双双中举，徐世光得第 75 名举人，徐世昌中第 154 名举人，徐世昌认为签中“光前”二字系指其弟世光，“昌大”系指世昌本人，考试结果与签中所言完全相合。徐世昌便相信自己前程无限，必定能昌大其门庭，从此终生笃信道教。他在居室里特别供奉吕洞宾神像，每天都要在像前叩头一百个，终生不改。据说，徐世昌赴京应试前，

袁世凯得知他路费不足，曾慷慨相助，使徐氏兄弟得以成行。徐氏兄弟中榜归来，又值徐府刘太夫人五十大寿，双喜临门，徐府大开筵席以示庆贺。当天，袁世凯携带一方写有“双桂承欢”四个大字的巨匾前来祝贺，兄弟相见，欢喜异常。

1886年(光绪十二年)，32岁的徐世昌再次赴京应礼部会试，得中第176名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光绪皇帝亲授其为翰林院庶吉士。

在徐世昌春风得意、三元及第的同时，他的结拜兄弟袁世凯却因顽劣异常，不学无术，屡次应试，皆名落孙山。袁世凯又羞又愤，一气之下将过去作的诗文付之一炬，自我解嘲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弃笔投戎，投奔庆军统领吴长庆。袁家与吴家为世交，袁世凯的父亲袁保庆与吴长庆为拜把兄弟，情同手足。吴长庆为报答袁保庆，特地将袁世凯收留在署中帮办文案，并让他跟随名流张謇等人学习文化。袁世凯从军后，很快便以其治事方面所特有的精练通达之奇才而屡获升迁。1895年，袁世凯奉命到天津小站练兵，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节制，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员。

再说身在翰林院的徐世昌，虽然地位崇高，但翰林院乃一清水衙门。翰林院掌院大学士李鸿藻是徐世昌的老师。李鸿藻认为徐世昌为人“虚矫过人”，很不喜欢他。徐世昌在翰林院很不得志，甚至连一个督学使者之类的机会都轮不到他头上。按照清朝惯例，翰林只要外放一任省级考官，就能做到腰包丰满，徐世昌得不到美差，就只能靠微薄的俸银过日子。翰林院编修是一个正七品京官，俸银很少，徐世昌三节时对老师的孝敬，每次只能送二两银子，生活之清苦可想而知。

曾经几次活动外放，都为其堂叔劝阻作罢。他堂叔告诉徐世昌，京官虽小，但接近上层权贵，只要有耐心等待，升迁的机会总比外官多，因此要他务必安心等待。

这一边，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后，1882年随吴开赴朝鲜，镇压朝鲜发生的“壬午政变”。袁负责前敌营务处，参与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昱应。此后，又奉命为朝鲜国王训练新建亲军，镇压开化党，支持事大党，受到清廷的褒奖，尤其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1885年10月，李鸿章保荐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1892年8月，袁以海关道记名简放，次年5月补授浙江温处道，仍留朝鲜。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见形势十分严重，便借故溜回国内，躲过了那场战争灾难。

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鉴于旧式湘、淮军已不足恃，有意改练新军。时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留在京城充“督办军务处”差委。经徐世昌介绍，袁世凯拜军机大臣、大学士李鸿藻为师，并和李鸿藻的儿子往还密切。通过种种关系，袁世凯终于被李鸿章推荐督练新建陆军。这是袁世凯一生飞黄腾达的起点。

1895年12月，袁世凯到天津附近的小站，接收“定武军”十营，计4700余人，随后又添募2000余人，仿照德国军队的建制，组成一支近7000人的“新建陆军”。袁世凯为了控制这支军队，造就一支个人势力，开始网罗为自己服务的人才。

1897年7月，袁世凯向光绪皇帝奏请以徐世昌以翰林兼管新建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务处总办（相当于秘书长）。袁还特地为徐世昌奏准保留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职务。徐世昌到任后，总揽全军文案，参与机密，成为袁世凯最得力的智囊和军师，袁世凯新军上下均称之为“徐相爷”。袁有事外出时，徐便代为管理军队。有了徐世昌的襄助，袁世凯如虎添翼，对于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系政治军事集团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也有人说徐世昌是北洋军队的灵魂。

徐世昌到任不久，便为袁世凯消弭了一场弥天大祸。原来，在徐世昌到天津小站前不久，便有人控告袁世凯克扣军饷、诛杀无

辜。清廷立派军机大臣荣禄会同陈夔龙前往查办此案。陈夔龙与徐世昌为同榜进士，后又双双拜翁同和为师，两人私交甚笃。荣禄一行到小站后，徐世昌便极力在陈夔龙面前为袁世凯疏通开脱，经陈夔龙从中说项，使荣禄产生恻隐之心，荣禄等奏请对袁世凯“乞恩姑从宽议”，以观后效，从而使袁世凯躲过了一场撤职危机。从此，袁世凯对徐世昌感恩戴德，从而也确立了徐在北洋集团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二、徐世昌与袁世凯均为有政治野心的人。在 1898 年开始的那场维新变法运动，徐世昌与袁世凯均充当了维新变法的同路人。然而，当守旧势力与变法势力公开摊牌，维新志士向袁世凯公开求救的时候，徐世昌却审时度势，劝说盟弟出卖了维新志士和光绪皇帝。

1894 年~1895 年的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在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爱国志士掀起了一个变法图存的运动，史称“戊戌维新”。

变法运动开始时，徐世昌、袁世凯为表明自己并非顽固不化的官僚，也参与了这场变法运动，成为维新运动的同路人。请看《徐世昌年谱》的有关记载：

“（1895 年）八月（徐世昌）与袁慰廷（世凯）、康长素（有为）诸君在嵩云里草营议开书局。”

“（1895 年）九月，回京，与张巽之、于晦若（式梅）、文芸阁（廷式）、梁卓如（启超）、汪伯唐（大燮）、沈子培（曾植）、英人李提摩太、美人李佳白、毕德格议设‘强学会’。”

1916 年康有为在劝袁世凯退位书中回忆这段往事时还说：

“追昔强学之会，饮酒高谈，坐以齿序，公（指袁世凯）呼吾

（康有为自称）为大哥，吾与公兄弟交也。今同会寥落，死亡殆尽，海外同志，惟吾与公及沈子培（曾植）、徐菊人（世昌）尚存，感旧款款，……”

据翁同和日记记载，当变法趋于高潮时，袁世凯还故意在帝党首领翁同和面前慷慨激昂地大讲什么瓜分在即，时局可危，“必须大变法，以图多保全数省”。

由此看来，袁世凯、徐世昌这对把兄弟确实参与了变法维新活动，而且是一对比比较活跃的角色。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下令变法图强。然而，很快便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反扑。四天后，反对变法的慈禧太后强令光绪皇帝将帝党首领、光绪帝的师傅翁同和开缺并驱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此外，慈禧太后令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完全控制了京畿大局。对此，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焦虑万分，苦思应付之策。维新派是一批赤手空拳的书生，他们亟需寻找一个握有军权的人来保护光绪帝和他们自身。康有为首先想到了袁世凯。康有为认为：“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昔与同办强学会，知其人与董（福祥）聂（士成）一武夫迥异，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但康有为又考虑袁世凯与荣禄关系密切，一时摸不准袁的态度，便首先派徐仁禄到天津小站去探虚实。徐仁禄见到袁世凯后，说：“康有为等屡向皇上荐举你（指袁）皇上说：‘荣禄讲过袁世凯跋扈，不可大用。’袁抢先回答说：‘昔常熟（翁同和）欲增我兵，荣禄谓汉人不能任握大兵权。常熟曰：曾、左亦汉人，何尝不能任大兵，然荣禄卒不肯增也。’”康有为听了徐仁禄的报告，便对袁世凯放心了。康有为立即上疏光绪帝，请召袁进京，予以重用。9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召见了袁世凯，召见中，光绪问：“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袁世凯连忙赌咒发誓：“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袁退出后，光

绪帝以为袁世凯忠诚可靠，便命内阁开去袁的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着随时具奏。光绪帝此举，意在使袁世凯摆脱荣禄控制。

在光绪帝召见袁世凯的同时，后党也作好了应变准备。荣禄调聂士成的武毅军驻扎天津，调董福祥的甘军移驻北京西南的长辛店。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势，康有为与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等开会，商议营救光绪之策，徐世昌也应邀参加了。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始终想不出一个万全之策，惟有捧诏大哭，想以此感动徐世昌，徐世昌亦哭，大家哭成一团。最后大家决定派谭嗣同前往袁世凯住处，劝说袁世凯兴师勤王。谭嗣同本来不相信袁世凯其人，而且林旭也曾写诗给谭嗣同，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林旭在诗中写道：“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诗中所谓“千里草”，隐指董福祥，本初即袁本初，袁绍，这里隐指袁世凯。但是康有为却很相信袁世凯，维新派病急乱投医，谭嗣同无奈之下，于9月18日深夜，只身跑到袁世凯在京城临时寓所——法华寺，进行了一场单刀直入的谈话。据梁启超著《谭嗣同传》记载，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谭问袁：“君谓皇上何如人也？”

袁答：“旷代圣主也。”

谭又问：“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答：“然，固有所闻。”

说至此，谭嗣同即出示光绪帝密诏对袁说：“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救，仆固愿闻也。”

谭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

皆受荣禄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谭问：“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言。

\*\*\*\*\*

谭说：“荣禄固（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矣。”

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谭嗣同听了袁世凯这么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辞，以为袁世凯真的被打动了，便与袁密商行动计划。袁世凯最后说：“今营中枪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袁世凯表示要赶快回天津部署，谭嗣同遂起身告辞。

袁的上述表白，人们很难肯定是真是假。不过，当他回到天津，听了徐世昌的一番分析后，态度便很明朗了。徐世昌说：

“帝虽一国之主，然当国日浅，势力脆薄，后则两朝总持魁柄，廷臣疆帅，均其心腹，成败之数，可以预卜。与其助帝而致祸，宁附后而取功名。”

徐世昌的这番话，分析形势剖析利害，终于促使袁世凯决定出卖光绪帝及维新派。随即，袁世凯即向直隶总督荣禄告了密。

21 日早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宣布自己重新训政，同时全面搜捕维新派人士。维新志士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喋血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维新变法运动至此彻底失败。

后来，有人写了一首歌谣谴责袁世凯贩卖维新志士的行为：

“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曾经在驻朝鲜时代做过袁世凯老师的状元郎张謇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是儿（指袁世凯）反侧能作贼，将祸天下，奈何！”

张謇真有预见性。袁世凯以后的作为完全验证了此话。不过，人们纷纷谴责袁世凯，却放过了在袁世凯背后出谋划策的徐世昌。其实，徐世昌同样也应该受到谴责。

三、袁世凯出卖维新党，换取了慈禧太后的赏识，从此仕途畅通无阻，平步青云，徐世昌也因之鸡犬升天。

慈禧太后将维新变法运动镇压下去后，立即召见了袁世凯，并让他代理了十天直隶总督，赐新建陆军白银 4000 两。荣禄任军机大臣，管理兵部事务，仍旧节制北洋各军。裕禄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帮办北洋军务。裕禄到任后，袁世凯仍回小站营次。

1899 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清廷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让他率武卫右军前往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徐世昌则交卸军中职务，仍回翰林院供职。

1900 年 5 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挟持光绪皇帝狼狈逃出北京，前往西安避难。徐世昌亦随行护驾。慈禧太后对在危难中随行护驾的官吏都认为是忠臣，另眼相看。1901 年四月初十，袁世凯又专奏保荐徐世昌。奏折称：

“查有翰林院编修徐世昌。公正笃诚，才识明练，前在臣军办理营务，遇事能持大体，不避劳怨。和将士，抚驭得宜，全军翕然悦服，尤于时局要政潜心考究，志切澄清，故以儒臣而晓畅军情，洞达世务，迹其神明内敛，局干隐然，洵称远到之器。”

袁世凯的奏折，将徐世昌着实吹嘘了一番，无疑加深了慈禧太后对徐世昌的印象。五月初四，慈禧太后即在逃亡途中召见了

徐世昌，慰勉有加。不久，即命徐世昌以道员交军机处记存。

1901年11月28日，清廷以袁世凯参与策划“东南互保”有功，晋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列各省督抚之上。1902年1月，又任命袁世凯兼任练兵大臣。

袁世凯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但一方面要扩充军队，另一方面又要避免满族亲贵的疑忌。袁世凯为此想出了一个花招，他建议清廷设立练兵处，并推荐庆亲王奕劻总理其事。清廷为了集中军权，立即接受了这一建议。1903年2月，清廷在兵部之外，另设立练兵处，以奕劻为总理练兵事务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为襄办大臣。表面上看，由满族贵族掌握了练兵处的大权，但练兵处的总提调是徐世昌，军令司正使是段祺瑞，军政司正使是刘永庆，军学司正使是王士珍，冯国璋、陆建章等为各司副使。他们都是袁世凯安插的亲信。实际上，练兵处实权仍操在袁世凯手里。

特别是奕劻，此人身兼军机处领班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练兵大臣和督办路矿大臣等多项要职，可他为人不仅昏庸而且异常贪婪，对行贿者来者不拒。只要行贿者用红纸封装上银票，当面交给他，说一声：“请王爷备赏。”奕劻便会笑嘻嘻地接过银票，口中还说：“您还要费心。”一场交易就算告成。因此奕劻有“庆记公司”的诨号。

袁世凯、徐世昌利用奕劻嗜财的特点，投其所好，大肆向奕劻行贿。袁并派门下谋士杨士琦专办此事。杨士琦第一次即给奕劻送去白银十万两，奕劻毫不迟疑地笑纳了。以后，袁世凯便源源不断地给奕劻送去大笔银子。这样一来，奕劻就自然地充当了袁世凯的保护伞。袁世凯无论是扩充军事实力还是夺取路矿和财政权力，都得到奕劻的支持和默许，在一切重大问题上，奕劻总是“无可无不可，一听命于北洋（即袁世凯）而已”。

到1905年春，袁世凯编练成六镇新军。除第一镇外，其余五

镇的统制（相当于后来的师长）皆为袁世凯的嫡系亲信，王英楷、段祺瑞、王士珍、段芝贵、曹锟、马龙标、张怀芝、王占元、吴长纯、吴凤岭、陈光远、赵国贤、李纯先后担任过统制。统领（相当于旅长）、统带（相当于团长）也均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代的旧班底。这样，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自成体系，俨然独立王国，其他势力根本插不进去，这就是后来袁世凯逼迫清朝皇帝退位、窃夺辛亥革命果实所依赖的资本。

在袁世凯、奕劻的推荐和提携下，徐世昌的地位也迅速窜升。1904年4月，署兵部左侍郎，1905年5月奉旨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两日后又奉旨派充政务处大臣，会办练兵大臣。9月，任巡警部尚书，11月，又奉旨署满兵部尚书，以汉员署满缺，这还是清代开国以来第一次。12月，补授军机大臣，兼署兵部汉尚书。1906年9月，巡警部改为民政部，仍任尚书。1907年3月，清廷任命徐世昌为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兼管东三省将军事务。袁世凯趁机又保荐私人亲信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分别为奉天、吉林、黑龙江巡抚。这样一来，东三省又成了袁世凯北洋派的势力范围。

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徐世昌从一个穷翰林扶摇直上，一路升到军机大臣、尚书、总督、钦差大臣，升迁之快，在清代历史上也堪称为异数。

奕劻、袁世凯、徐世昌三人相互结纳，狼狈为奸，把持朝政，激起清廷内部其他派系的强烈反感，从而酿成了“丁未政潮”。

1907年5月7日，监察御史赵启霖奏劾段芝贵夤缘无耻，买天津歌妓杨翠喜献给奕劻之子载振，并赠以十万金为奕劻祝寿，因而得到黑龙江巡抚之职。事情一揭穿，舆论哗然，段芝贵、载振都感到十分狼狈。数日后，清廷宣布撤去段芝贵的布政使衔，并撤回署理黑龙江巡抚的任命。载振自请辞去农工商部尚书，亦获准。这一回合，奕劻、袁世凯遭到沉重打击。

接着，湖北按察司梁鼎芬参劾袁世凯与庆亲王专权误国，并附带参了徐世昌一本。称“徐世昌以翰林起家、无资望、无功绩，一跃而为东三省总督，权势在各督抚之上，此皆袁世凯荐之，庆王行之”。

面对这接踵而来的不利局面，奕劻、袁世凯不甘心就此失败，立即布置反击。袁世凯的亲信世续、徐世昌更是异常卖力地替奕、袁等人开脱。袁世凯在写给两江总督端方的密札中写道：

“大谋（隐指岑春煊）此来，有某枢（隐指瞿鸿禨）暗许引进，预为布置台谏。大谋发端，群伏响应。大老（隐指奕劻）被困，情形甚险。幸大老平时厚道，颇得多助，得出此内外夹攻之厄。伯轩（世续）、菊人（徐世昌）甚出力，上怒乃解。”

结果，奕劻、袁世凯不仅没有倒台，而且反戈一击，将瞿鸿禨、岑春煊、林绍年等一一开缺。

袁世凯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虽然取得了胜利，但言官们对他的弹劾并未停止。有人弹劾袁世凯：其人权谋迈众，城府甚深，能谄人，又能用人，完全是汉末曹操、晋末刘裕之流的人物。一个接一个的弹劾警告。使得慈禧太后疑窦丛生，对袁世凯的信用完全动摇。9月4日，清廷下令免去袁世凯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调任外务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剥夺了袁世凯对北洋军的直接指挥权。清廷同时还将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任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比总督地位高，但基本上是承旨办事，没有总督那样的实权。慈禧如此安排，意在阳为尊崇，阴实裁抑。

袁世凯离开他经营多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重要职位，对北洋派来说，是一个打击。但由于北洋派的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北洋派势力又扩展到东三省，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四、载沣当上摄政王后，为其兄光绪皇帝报仇，以袁世凯“患足疾”为由，将其“开缺回籍养病”。袁世凯被罢斥后，徐世

昌四出活动，疏通各个关节，终于借辛亥革命之机，促成了袁世凯的东山再起。

1908年11月14日、15日，清王朝的两位最高统治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隔一天先后去世。据说，光绪帝死前曾留下一道“必杀袁世凯”的遗诏。这遗诏是否可靠，现已无从考证。不过，自从袁世凯出卖光绪帝，导致光绪帝幽居瀛台后，光绪帝对袁的仇恨是不言而喻的。据说，1900年庚子事变，光绪被慈禧挟持逃往西安，光绪经常“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即袁世凯）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几以此为常课”。光绪帝幽居瀛台期间，“恶袁甚”，“日书其姓名，粉碎之”。

光绪帝死后，由年仅3岁的溥仪继位，年号为宣统，溥仪生父载沣任摄政王。载沣是光绪帝的弟弟，他决心除掉袁世凯，为兄报仇雪恨，以杜后患。载沣拟了一道将袁世凯革职拿交法部治罪的上谕，但遭到奕劻、张之洞等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为人优柔寡断的载沣经奕劻等人一反对，便没有了主张，不得不将谕旨修改。1909年1月2日，清廷发布的谕旨称：

“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夙承先朝屡加擢用。朕御极后复予懋赏，正以其才可用，俾效驰驱，不意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积任，袁世凯着即开缺回籍养病，以示体恤之至意。”

袁世凯被罢职的消息，对徐世昌来说，可说是晴天霹雳，顿有唇亡齿寒之感。徐世昌不得不以退为进，立即上奏请求开缺。徐世昌在上奏中说：

“世昌年少孤苦，身体本来就亏，常生疾病。今已五十有五，精力日衰，气血日耗，百病丛生，五中焦灼。边地苦寒，风雪多厉，因而旧恙经常发作。再因东省头绪纷繁，劳顿过度，心力更加不支，各种病情变相发作，精力骤减，彻夜不寐，神事健忘。医家认为这是气血交亏，非静心调养，赶紧医治，万难奏效。俯请

天恩开缺回籍，迅速简派大员代理。”

清王朝权贵虽然忌恨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派势力，但鉴于北洋势力已经遍布政府各部门，盘根错节，不可能彻底清除。因害怕北洋派作困兽之斗，也不敢过于穷追不舍。因此，清王朝对徐世昌的开缺请求未予批准，仅将其从最重要的东三省总督调为稍为次要的职务——内阁邮传部尚书。徐世昌仍跻身于中枢之列，但其地位显然不如东三省总督之时。

徐世昌对于以载沣为首的满族权贵排斥汉大臣，一味集权于皇室的作法是非常不满的，他后来说：

“清朝之亡，并不是亡于革命党，而是亡于一班‘小爷们’身上。起初，我在东北，项城在北洋，张之洞在湖北，这三个重镇都安排了极有作为的人。等到太后一死，小爷们当了权，胡闹起来，项城被罢黜了，我被调回京，当邮传部尚书了，而新的继任人选，都是庸碌之辈，朝政由此大乱，革命党怎么不乘机起来呢？”

再说，袁世凯被罢官后，他未回项城老家，初居汲县，不久即迁居辉县。辉县城西北五里有河南名胜百泉。百泉是卫水之源，泉水清澈见底，周围楼台亭阁与嵯峨苍翠的苏门山交相辉映，风景佳丽，自汉晋以来，即为名流隐士们的游览栖足之所。袁世凯迁居此地后，即与徐世昌发起捐资重修百泉、苏门山名胜。徐世昌在《重修百泉祠庙碑》文中写道：

“时方多事，风云倏扰，不知所穷，要非沉雄俊伟之才，不足以贞多难。意者风教所树，英材骏足接踵而兴，世变赖以康济。”

明眼人一看便知，徐世昌所指的“英材”、“沉雄俊伟之才”。正是指的袁世凯。这无异于一篇治理国家“舍袁莫属”的政治宣言，徐世昌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为其盟弟造声势，造舆论。

1911年5月，清王朝标榜实行预备立宪，宣布成立责任内阁。这个责任内阁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大臣 奕劻

协理大臣 那桐、徐世昌  
外务部大臣 梁敦彦  
民政部大臣 善耆  
度支部大臣 载涛  
学务部大臣 唐景崇  
陆军部大臣 荫昌  
海军部大臣 载洵  
司法部大臣 绍昌  
农工部大臣 溥伦  
邮传部大臣 盛宣怀  
理藩部大臣 寿耆

据说，在酝酿内阁人选时，徐世昌曾主动对那桐说：“此席予居不称，唯慰亭（袁世凯字慰亭）才足胜任，而以朋党嫌疑，不便论到，奈何？”那桐听后，马上表示：“是何难？我言之可耳。”于是，那桐立即上奏，主张启用袁世凯。那桐在上奏中说：

“袁世凯智勇深沉，深谋远虑，其才具胜臣十倍。其輿望众口交相称扬，前因足疾罢归田里，现已两年有余，当已医治痊愈。恳请起用，赞襄政务。”

接着，徐世昌也专门上奏，请求辞去内阁协理大臣，要清廷另简贤能。徐世昌在奏折中称：

“臣病衰孱弱，难胜职任，请准辞内阁大臣差使，另简贤能，以当重作，予任顾问即可。”

清廷对于那桐荐举袁世凯予以申斥，而对于徐世昌的辞职要求予以慰留。对于“另简贤能”，即起用袁世凯一节，未予理睬。

徐世昌等人多方奔走，呼吁清廷起用袁世凯，虽然暂时未能达到目的，但无形之中，给清廷施加了巨大压力。

为时不久，袁世凯东山再起的机会终于来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爆发，到12日，武

汉三镇全部光复。

武昌起义，给清朝统治者当头一棒。消息传来，北京城里一片恐慌混乱，王公大臣们遑遑不可终日。早已被袁世凯用巨款收买了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觉得这是一个促袁出山的绝好机会，于是正式提议起用袁世凯，徐世昌、那桐立即附和，一起向摄政王载沣施加压力。载沣对此极为反感，并对愿以身家性命做担保的那桐予以严厉申斥。于是，那桐马上提出辞职，奕劻也不再上朝议事。前线军情紧急，载沣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妥协，将奕劻、那桐、徐世昌等人的请求重新计议。奕劻说：“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券，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且东交民巷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故本人如此主张。”载沣仍不放心，又进一步诘问：“你能担保没有别的问题吗？”奕劻回答：“这个不消说的。”一向毫无主见的载沣见奕劻等人极力坚持请袁出山，自己又想不出合适的人选，也只好屈从。载沣忍着眼泪对奕劻等人说：“你们既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但是你们不能卸责。”起用袁世凯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利用袁世凯去镇压革命党人，对于清王朝来说，无异于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据说，有人曾问那桐：你们这样做，不是加速清朝灭亡吗？不料那桐回答说：“大势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可稍缓，或可不亡。”由此看来，清王朝已经到了饮鸩止渴、气数将尽的地步，无人能挽救它的命运了。

10月14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所有该省军队及各路援军，均归袁世凯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统领的水陆各军，亦得会同调遣。上谕并要求袁世凯顾全大局，不要推辞。

老奸巨滑的袁世凯见摄政王屈服，内心十分高兴。但他不是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供人任意驱使的人，对清廷授予他湖

广总督，并不热心，他要等等看，以进一步吊吊载沅的胃口，从清廷手中夺取更大的权力。于是袁世凯立即给清廷回了一个奏折，在奏折中，袁世凯不仅对摄政王冷嘲热讽，而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载沅两年前以足疾为由罢免袁世凯。如今，袁世凯立即以足疾未愈为由拒不受命，真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过，在出了一口恶气之后，也没有把话说绝。在奏折中袁世凯最后表示：“一俟稍可支持，即可力疾就道，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这就为他讨价还价留了一条后路。

这可急坏了清王朝的权贵们。10月20日，徐世昌受奕劻之命，亲赴彰德“劝驾”。徐世昌与袁世凯见面后，即密定了“相机要挟”的对策，他们还具体商定了六条要求。由徐世昌携回京师，向清廷提出，这六条要求是：

- 一、明年召开国会；
- 二、组织责任内阁；
- 三、宽容参予此次事件诸人；
- 四、解除党禁；
- 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
- 六、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

徐世昌回到北京后，即将向载沅作了转达。载沅这时已经六神无主，病急乱投医，竟然全部接受了袁世凯提出的条件。10月2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陆军、长江水师和此次派出各军，均归其节制调遣。10月30日袁世凯离开彰德南下视师。11月1日抵达湖北孝感，指挥镇压革命起义。同一天，奕劻奏请辞职，清廷准其所请，开去奕劻的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的协理大臣和其他大臣的职务，任命奕劻为弼德院院长，徐、那为弼德院顾问大臣。清廷授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命其进京组织完全内阁，同时仍然兼管前线军事。

袁世凯接到圣旨，忍不住发出了一阵阵狡狴的微笑，但他仍